

## 北京輔仁大學的辦學特色及其歷史啟示

孫邦華\*

### 摘 要

北京輔仁大學儘管存在時間很短，但是，它以其富有特色的辦學活動、培育了不少精英人才的顯著成就，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以中西文化的融會與貫通為宗旨、在學科建設上以突出重點為發展戰略、在教學方法上以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為目標、實行嚴進嚴出的教學管理以精英人才為培養目標、在科學研究上強調「動國際而垂久遠」的精神等辦學特色是一筆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對當前高等教育管理、學風建設、學科發展、大學精神的弘揚、大學生人文素質的培育、學術發展等諸方面都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北京輔仁大學、陳垣、辦學特色、歷史啟示

---

\*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歷史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北京輔仁大學（1925-1952年）儘管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而只存在了近27年，未及「而立」之年便已夭折，但是，它以其富有特色的辦學活動、培育了不少精英人才的顯著成就，在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它的許多辦學思想、方法，即使對當代高等教育辦學實踐仍有不少重要的借鑒意義。

### 一、以中西文化的融會與貫通為宗旨

自從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於1807年遠涉重洋來到廣州，重新揭開西方文化教育在中國傳播的序幕之後，中西文化教育的交彙、衝撞、融合成為中國近代社會的一個永恒主題。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派別、不同學術流派的人對待中西方文化的態度和觀點是各不相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針鋒相對。如果說整個清末的中西文化關係的特點是「中體西用」、「東風」壓倒「西風」，那麼，以新文化運動為歷史界標，則是逐漸「全盤西化」、「西風」壓倒「東風」。倡設於民國元年、誕生於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北京輔仁大學在辦學宗旨上對待中西方文化是怎樣的態度呢？我們不妨從創始人英斂之、校長陳垣的辦學思想到輔仁章程等方面入手進行分析。

英斂之的態度非常鮮明，就是既要輸入西方先進科學，又要保存優秀傳統國學。英斂之出身旗人之家，自幼習武，將近弱冠時，漸漸發現「此等伎倆見遺於社會，無補於身家，遂棄之」<sup>1</sup>，便棄武從文。依靠自學，博覽中外群書，尤其愛好當時介紹西方新知識的著作或譯述<sup>2</sup>，因此而躋身於文化人行列，從事辦報、辦學活動。

1902年6月17日，英斂之在天津創刊《大公報》，並以介紹歐西學術，啟牖同胞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為宗旨。<sup>3</sup>民國初年，他從報館事務退下來之後，致力於中國天主教高等教育。他主張以西方科學開啟民智，但並不排斥中國固有文化。一方面，他於1917年撰寫文章痛斥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掌控的天主教修會所實行的愚民傳教策略，漠視高等教育，蔑視中國文化。<sup>4</sup>另一方面，他對於自清末以來一些粗通西學、喜新厭舊的青年人所表現出的厭棄中國文化的不良傾向和「國學」淪喪的局面而憂慮不已，他說：「最可惜者，粗解橫書浮慕西法之輩，襲取人之皮毛，犧牲

<sup>1</sup> 英斂之，〈自序〉，《也是集》，天津大公報館光緒丁未（1907年）夏刊行。

<sup>2</sup> 方豪，〈英斂之先生創辦《大公報》的經過〉，上，《傳記文學》（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第三卷第二期。

<sup>3</sup> 英斂之，〈大公報序〉，《大公報》（1902年6月17日）。

<sup>4</sup> 英華，《勸學罪言》，1929年重印本（自刊）。

其所可貴，買 還珠，邯鄲學步」<sup>5</sup>又對當時的「保存國粹」思潮不以為然，<sup>6</sup>認為厭棄國學固然可憂，「苟但醉心歐化，稗販唾餘，致失其固有之良，豈非下喬入幽，而不善變者耶」。<sup>7</sup>但是，也不能簡單地提倡「保存國粹」，因為「國粹」中有糟粕。對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吸取和保存各自的優秀部分。「介紹西歐新得科學文化之最精者，並保存中國舊有文學美術之最善者，舍短取長，不使偏勝。」<sup>8</sup>

英斂之自 1912 年在北京香山創辦輔仁社，到 1925 年開辦公教大學輔仁社（又名國學專修科），均以「輔仁」命名，可謂他的用心良苦。其一，就是專事國學之研究，故取《論語》「會友輔仁」之義，<sup>9</sup>兩個輔仁社，在課程上也都是中文、歷史、哲學等國學內容，把重視國學教育、以保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付諸教育實踐。其二，「會友輔仁」的義蘊還包括吸取西方最新科學文化，用「西方新得科學文化之最精者」補中國文化之不足者。

輔仁大學很好地繼承了奠基人英斂之的辦學理念。譬如，1927 年夏，大學正式建立時，校董事會便決定把它命名為輔仁大學，<sup>10</sup>並且把英斂之倡導的「注重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思想寫入學校章程，確立為辦學宗旨<sup>11</sup>目的在於培養融會古今、學貫中西的新式人才。作為一所天主教大學，輔仁的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約 70% 為中方人士，30% 則為先後由本篤會、聖言會派遣來的天主教學者或其他學者，中西結合的教師和管理隊伍為融會與貫通中西文化提供了良好而必備的師資條件。在輔仁大學執教的著名漢學家、聖言會神父鮑潤生於 1935 年創辦《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以英文、德文、法文發表中外學者（以西方學者為主）有關研究中國社會、歷史、風俗、宗教等內容的學術論文。它出版至今，而不間斷，因而是以西方語言出版的歷史最悠久、同時也是最具重要

<sup>5</sup> 英斂之、奧圖爾，〈美國聖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輔仁生活》，第四期（1940 年 2 月 25 日）。

<sup>6</sup> 英斂之，《論保存國粹》（1906 年）；英斂之，《也是集》（天津大公報館光緒丁未，1907 年夏刊印）。

<sup>7</sup> 英斂之、奧圖爾，〈美國聖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輔仁生活》，第四期（1940 年 2 月 25 日），第 12 頁。

<sup>8</sup> 英斂之、奧圖爾，〈美國聖本篤會創設北京公教大學宣言〉，《輔仁生活》，第四期（1940 年 2 月 25 日），第 12 頁。

<sup>9</sup> 英斂之，〈北京公教大學附屬輔仁社簡章〉，《輔仁生活》，第五期（1940 年 3 月 25 日），第 11 頁。

<sup>10</sup> 輔仁大學檔案·案卷號：12，〈函教育總長請派員視察正式認可〉（現藏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下同）。

<sup>11</sup> 輔仁大學檔案·案卷號：8，〈私立北平輔仁大學組織大綱〉。

性的漢學期刊之一，是天主教唯一有關漢學的期刊。<sup>12</sup>僅此一項，我們就可以說輔仁的外籍教師不僅通過教學把西方科學文化介紹到中國，而且通過學術研究和期刊把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社會，以實際活動詮釋了「會友輔仁」、融會中西的辦學宗旨。

輔仁大學非常重視語言的教學，首先，它作為教會大學自然非常重視外語教學。由於初期的外籍管理人員和老師多為美國人，第一外語自然為英語。輔仁大學英語教育並不是為了培養一批到洋行裏做事的買辦，而是培養直接獲取西方科學文化的能力。正如時任教務長的劉半農所說：「我們以為時至今日，學術已有了世界化的趨勢；無論學文學，學科學，倘不能直接看外國書，只憑翻譯本子，那終是隔靴搔癢。倘使能直接看外國書，就可以增加許多知識的源流和做學問的門徑。」<sup>13</sup>按照當時的大學教育法令，高校學生必須學習兩門外語，但是，有的大學對第二外國語「多視若具文，有沒有幾乎一樣」，但是，輔仁對兩門外語課都很重視，劉半農認為：「一個人不懂一種外國語是太陋；倘只懂一種外國語，則很危險。」因為人們容易以為他所瞭解的一種文化都是好的，而排斥其他文化，如果在掌握兩種語言的基礎上，瞭解兩種不同文化，並對兩種文化作比較研究，就不會犯那樣的毛病。<sup>14</sup>這同樣體現了會友輔仁的宗旨。輔仁大學的第二外語首選為德語，其次是法語，日本侵佔時期（1937-1945年）增加日語。兩門外語的掌握為輔仁大學把世界西方最新科學知識、理論納入學校的教學內容提供了良好的語言條件。除西語系外，物理系、化學系、生物系、心理系、哲學系等教師先後以美籍、德籍教授為主，課程也相應地採用美國和德國大學制度，各基礎和專業課程一般都使用原版英文、德文原版教材。

輔仁非常重視國文教育及其作文。國文課不僅被確定為一年級各專業的公共必修課，而且從師資的選聘、教材的編寫、教學方法的指導、統一考試等整個教學環節，都由校長陳垣親自負責，陳垣每學年都要親自擔任這門課的教學工作，以引起全校師生對它的重視。課文主要選自《史記》、《漢書》古代正史著作和古代文史大家的文章，約計 30 餘篇，絕大部分為文言文，陳垣要求學生對課文「熟讀如流」。<sup>15</sup>

<sup>12</sup> 柯慕安 (Miroslav Kollar) 撰、查岱山譯，〈鮑潤生神父為《華裔學志》的創辦者——他的生平與事業〉，收入魏思齊 (Zbigniew Wesolowski) 編，《有關中國學術性的對話：以〈華裔學志〉為例》（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 21 頁。

<sup>13</sup> 劉半農，〈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半農雜文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1935年 7 月），第 206 頁。

<sup>14</sup> 劉半農，〈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半農雜文二集》，第 207 頁。

<sup>15</sup>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 647 頁。

在全球化時代，學習世界一切先進科學和優秀文化已是再尋常不過的事，但是，總會面臨如何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的問題。面對西方強勢文化的衝擊，民族傳統文化日漸式微，已是不爭的事實。有些人甚至言必稱西方，對傳統文化不屑一顧，乃至全盤否定。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們需要培養的是融會中西的人才，而不是西方化的殘缺之士。大學作為思想、文化的傳承者、創造者，發揚和保存民族優秀文化應當是義不容辭的任務。輔仁大學從辦學伊始就既注意接受世界最新科學知識，又不排斥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重視外語和國文教育，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也是值得當代中國大學教育借鑒和發揚的優良傳統。

## 二、在學科建設上以突出重點為發展戰略

輔仁大學位於當時中國的文化中心北京，大學林立，更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燕京大學等四所名校，置身這種名校集中的環境裏，激烈競爭在所難免。新生的輔仁大學如何立足和發展便成為擺在學校主辦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大學發展的關鍵是學科建設，學科建設的根本在於建立一支教學和科研水平很高的教師隊伍。教師無論在任何時候都是大學的靈魂和核心，正如著名教育家、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所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sup>16</sup>陳垣等人首先注重在教師聘任上下工夫。

輔大一開始就從多種方式延請教師。首先，利用後發優勢，注意從國內特別是北京的一些著名大學網羅名師，其中，以北京大學名教授為主，如沈兼士、劉半農、魏建功、羅常培（以上為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朱希祖（著名文史專家）、沈尹默、鄭振鐸（以上著名文學家）、李泰棻、鄧之誠（以上著名歷史學家）、馬衡（著名金石學家、考古學家）、劉鈞（著名教育學專家）、王仁輔（數學家）。另外，從北京師範大學敦請孫人和、孫楷第（均為著名中國古典文學和文獻學家），從清華大學聘請薩本鐵（化學家），從清華大學延請趙萬裏（著名版本學家、目錄學家）；其次，惠眼識才，注意從社會上發掘人才，包括沒有大學文憑而自學成才和沒有大學執教經歷的名學者，如余嘉錫（著名目錄學家、文史學家）、倫明（著名目錄學家和古物古籍收藏家）、溥雪齋（著名書畫家）、唐蘭（著名古文家學家、金石學家）、於省吾（著名古文學家）等；再次，非常注意延聘從國外名校留學歸來的博士、學者，如英千里（著名英國文學家）、張星烺

<sup>16</sup> 梅貽琦，〈就職演說〉，收入楊東平，《大學精神》（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第353頁。

(著名中西交通史專家)、姚士鼇(著名蒙古史專家)、張懷(教育學家)、徐恃峰(教育學專家)、王征葵(教育心理學家)、朱光潛(著名文學家評論家、美學家)、王靜如(著名西夏語言學家)、張漢民(著名生物學家)、王晨(化學家)、張重一、趙錫禹、魏重慶(以上經濟學家)、劉景芳(法國國家數學博士、數學家)、王普(著名核子物理學家)、錢思亮(著名化學家)等人。他們來輔仁後，有的擔任專任教授，有的是兼職教授，但大都是骨幹教師。第四，天主教修會本篤會、聖言會先後派遣學者到輔仁援教，或應邀物色歐美學者前來執教，其中不乏名教授、科學家，譬如，嚴池(著名物理學家，物理系教授兼理學院院長)、歐思德(著名物理學家，物理系教授兼主任)、李嘉士(著名物理學家，數理系教授兼主任)、卜樂天(著名化學家、化學系教授兼主任)、郝岑(化學系教授)、蔣達士(生物系教授)、馬德武(生物學系教授)、雷冕(著名人類學家，校務長)、史祿國(世界著名人類學家之一、社會經濟系教授)、鮑潤生(著名漢學家、社會經濟系教授兼主任)、吳保黎(社會學專家)、司徒資(西洋史專家)、薩達利(西洋中古史和近世史、印度史專家)、顧爾格倫(西洋上古史專家)、包敏(西洋史學理論與方法、民族學專家)、艾克(條頓及斯拉夫民族文學專家、西語系教授)、桑德厚(英國文學專家)、黎白(修女，英國文學史專家)、葛爾慈(心理學家、心理系主任)、裴德(修女，心理學專家)胡魯士(西洋史學家、教務長)、費知本(西方哲學專家、哲心系教授兼哲學組組長)、謝理士(西語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吳彬雅(修女，著名民生學家，家政系教授兼主任)等；第五，在抗日戰爭期間，華北、華東、華中等地大學被迫向西南、西北地區遷移，輔仁成為當時華北地區唯一不懸掛日偽旗幟、不讀偽教科書的大學，在此情形下，學校及時地把一些原來在其他大學任教而無法隨學校內遷的教授、學者聘請進來，如顧隨(著名古典文獻學家，原燕京大學教授)、高步瀛(著名古典文獻學家，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盼遂(著名文字學、考據學、目錄學家，原清華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楊成章(教育學家，原燕京大學、民國大學教授)、李霽野(著名翻譯家、文學家，原河北女子師範學院教師)、唐悅良(英國文學專家，原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褚聖麟(著名物理學家，原燕京大學教授)、薩本棟(著名物理學家，原清學大學教授)、王晨(化學專家、原北京大學和北平大學教師)、張子高(著名化學家、原清華大學教授)等人，自1938年至1945年先後轉到輔仁，進一步加強了學校教師力量。

陳垣等主辦者為學校延聘中西教師，中文系是清一色的中國教師，歷史學、經濟學等教師以中國學者為主，輔之以歐美專家、著名學者。物理、

化學、外語、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教師則以來自美國、德國、荷蘭、義大利、俄羅斯等外籍名教授、科學家為主，輔之中國著名學者。正是由於陳垣等人在教師延聘上頗下心力，使輔仁大學從創辦之初就彙集了不少名教授、名學者，從而較快地跨入了名校行列，30年代，與北大、清華、燕京、北師大等合稱為北京「五大學」，起點很高。3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抗戰」時期），輔仁大學在華北地區孑然屹立，一枝獨放，不僅名師薈萃，更是淪陷區愛國青年向往的知識殿堂和精神家園。

縱觀輔仁大學的發展，在教師隊伍建設上，一方面從國內大學和社會上深入挖掘名師或真才實學的人才，擔任專任或兼職教授，但是，兼職教師一律親執教鞭，不設「兼而不職」的挂名教授，另一方面則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給大學教育所帶來的積極影響，非常注意從歐美大學敦聘外籍教授、學者和吸引學成歸來的中國留學生，充實和加強師資力量。

輔仁大學在學科建設和發展上，沒有追求「大而全」，也不是謀求均衡發展，而是實施突出重點的發展戰略。在文學、理學、教育三個學院中，根據主客觀條件，重點建設國文系、歷史系、物理系、化學系、心理系，尤其是國文系、歷史系是輔大建立最早的學科，也始終是學科發展的重中之重，因而很快就發展成為人才濟濟、名師薈萃的名牌學科。其國學師資力量，與當時國內任何一所著名的國立和私立大學相比，也是不遜色的，輔大因此成為了當時中國國學教育和研究的重鎮。重點學科的建設和發展，既提升了輔仁大學的社會聲望，也帶動了校內其他學科的發展。

把建設一支隊伍整齊、實力雄厚的教師隊伍作為學科建設的重點；注意從國內外多渠道網羅教師，實施名師戰略；選取一個到幾個有條件、有基礎的學科進行重點建設，力求達到國內乃至國際一流，然後帶動其他學科的發展，這幾個方面無疑是輔仁大學在學科建設戰略上的特色，也是一條成功的辦學經驗，在當前的大學教育中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 三、在教學方法上以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為目標

輔仁大學有研究生和本科生兩種層次的教育，<sup>17</sup>但是，由於研究生招收和培養的規模很小，本科生培養始終是學校教育的主體。輔仁大學辦學者深受蔡元培先生關於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最高學府的思想影響，學校從正式創辦伊始便實踐了這一辦學思想，注重本科生的科研能力培養，以

<sup>17</sup> 1937年6月，輔仁大學經教育部批准正式設立文科研究所史學部、理科研究所物理學部，並於次年（1938）秋季開始正式招收研究生。以後又陸續增設了人類學研究部（1944年）、經濟學研究部（未招生）、化學研究部（1941年秋）、生物學研究部（1941年秋）。

養成研究高深學術的人才為主要目標。「大學設教，在應社會之需求，養成高深學術之人才，以期將來致用於社會。所謂高深學術之人才，必須賴大學教育培養者。」<sup>18</sup>

為了實施培養學生研究能力的辦學思想，在陳垣等人的領導下，輔仁大學採取了一些具體而有特色的舉措。

首先，聘任教師注重專才。陳垣始終堅持聘請學有所長的專才而不是通才原則，以史學系教師為例，他主要是選擇研究某一二個朝代的斷代史和某一二類的專題史人才，不歡迎做「空泛弘廓」學問的人。聘請學有專長的教師，為學校實施培養研究高深學問的人才提供了必要的師資條件。

其次，在課程體系的功能上，既注意傳授基本知識，更注重於「啟發學生自動研究之能力」。如文學院社會經濟學系在制定課程體系時，明確揭示：

本系之目的，為應我國現勢之需要，造就有充分社會學與經濟學知識之人才，課程之設備，于明理、致用二端雙方並重，講授方面，不但注重於基本知識之灌輸，現代科學方法之訓練，尤著重於啟發學生自動研究之能力，使學生修業期滿之後，無論應世或作更高深之研究，皆有相當之準備。<sup>19</sup>

在課程設置上，學校各院系一二年級「授以各種基礎科目」，三四年級「即導以自動研究各項專題」。<sup>20</sup>

再次，在教學方法上注重研究能力的培養。如陳垣為史學系三年級學生開設的選修課「史源學實習」就是注重研究能力培養的典型，該門課程先後以《廿二史劄記》、《日知錄》、《鮚埼亭集》等清代史學名著為物件，要求學生「將文中人名、故事出處考出，晦者釋之，誤者正之。」<sup>21</sup>通過學生的親身實踐和反復訓練，使其掌握中國傳統考據學研究方法，培養學生史學研究的基本技能，即「自動研究之能力」。

第四，試行導師制。為了激發學生的「自動研究」能力和興趣，輔仁大學除了在課堂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學問的能力外，還注意在課外活動中對學生進行指導。為了使之制度化、規範化，張懷領導的教育學院採取了實質性舉措，即最遲於1932年率先試行導師制，「本院為增進學生學業，提倡自動研究，並將教授于課外更盡啟迪指導之責任起見，施行導

<sup>18</sup> 〈北平輔仁大學教育學院概覽〉（民國21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2年），第4頁。

<sup>19</sup> 〈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概覽〉（民國24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5年）。

<sup>20</sup> 〈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概覽〉（民國24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5年）。

<sup>21</sup>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第694-695頁。



師制。」<sup>22</sup>將各系學生分成若干個組，每組由一名導師擔任指導工作。導師的責任為：指導自學方法；指定參考書；引導參觀或課外實驗；組織學術講演比賽。每學期，學院召開二次導師會議，由導師報告各組活動情況，討論活動中出現的問題。<sup>23</sup>後來教育學系又把它發展成為由該教授每人負責指導一個年級學生的研習工作。譬如，1939年度時，一年級由院長兼系主任張懷教授負責，注重讀書指導。並指定桑戴克與蓋滋合著的《教育原理》，要求學生逐章深究，或質問疑難，或討論問題，或輪流講演，或讀書報告，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奠定教育基本原理的初步根基。二年級由楊成章教授指導，注重自動之研習，先教之利用圖書館進行研習的方法，再指導個別問題的研究。三年級由徐待峰教授指導研習中等教育問題。按規定，每名學生在學年結束時，必須寫出書面研習報告，並取名為升級論文。四年級的研習指導則與畢業論文指導合而為一。<sup>24</sup>輔仁教育學系要求學生必須有升級論文，<sup>25</sup>明顯把西方大學辦學方法移植過來，並以通過課外活動培養學生研習學問的興趣和能力為基礎，從而臻於制度化，這是其辦學的重要特色。不久，沈兼士領導的文學院則規定所屬各系（國文系、史學系、社會經濟系）分別設立研究室，由教授指導高年級學生，「以期養成自動研究之學風」。<sup>26</sup>

第五，實施特別研究工作指導。輔仁大學各學院還根據各教授的學術研究領域和本科學生的實際能力等情況，集體公佈一些研究課題目錄，由學生自願選擇其中的一個問題，在教授指導下進行研究，並將之取名為「特別研究工作」。所公佈的研究目錄，實際上對本科學生學士學位論文的選題起到了指導作用。<sup>27</sup>

輔仁大學長期致力於傳授高深學術，非常注重培養本科學生科學研究的能力和興趣，也就是培養學生在學習和學術上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還為此而採取了各種具體的措施或辦法，並使之制度化、經常化、規範化，這是輔仁大學辦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也是輔仁大學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培養出眾多學術研究人才的重要原因。今天中國大陸的知名大學紛紛把「研究型」作為各自大學的發展目標，但是，這些大學幾乎都把擴招和培養碩士

<sup>22</sup> 〈北平輔仁大學教育學院概覽〉（民國 21 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2 年），第 11 頁。

<sup>23</sup> 〈北平輔仁大學教育學院概覽〉（民國 21 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2 年），第 11-12 頁。

<sup>24</sup> 〈介紹輔仁的教育學系〉，《輔仁生活》，第四期（1940 年 1 月 25 日），第 16 頁。

<sup>25</sup> 〈關於教育學院〉，《輔大年刊》（1939 年）。

<sup>26</sup> 〈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概覽〉（民國 24 年度），輔仁大學生秘書處印（1935 年）。

<sup>27</sup> 孫邦華，《身等國寶 志存輔仁——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 212-221 頁。

生、博士生作為對「研究型大學」的理解，而相應地忽視了培養本科生研究興趣和能力的重要性，這無疑是本末倒置，曲解了「研究型大學」的真義。

#### 四、實行嚴進嚴出的教學管理以精英人才為培養目標

輔仁大學對學生一直實行高標準、嚴要求的教學管理制度，並且體現在招生、培養過程、畢業考試等人才陶育的整個過程之中。

正如企業要提高產品質量必須要有好的原材料，因而需要把好原材料關一樣，大學為了人才培養的質量也必須從入學招生抓起。

當時的大學招生沒有實行聯考制度（全國統一的考試），考試都是由各大學自己組織，自定考試科目、自主命題。凡是進入輔仁的學生都是經過非常嚴格入學選拔考試。考試又分筆試和口試。

筆試分各院系共同考試科目和分系加試科目兩種。以 30 年代中期為例，共同考試科目為：國文、英語、數學，後來增加黨義 1 科。加試科目與各系的專業基礎知識密切相關，具體情況如下表：<sup>28</sup>

系 別	國文系	西語系	史學系 哲學系 社會經濟系 教育學系	數學系 物理系	化學系 生物系	心理系	美術專修科
加試科目	1、國學常識 2、中外史地	西洋歷史	中外史地	1、物理 2、數學	1、物理 2、化學	科學常識	1、繪畫 2、書法

當時的大學入學考試沒有範圍，筆試只是就高中畢業的水準命題，<sup>29</sup>沒有紮實的基本功是無法通過的。以國文試題為例，內容包括文言文加新式標點，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命題作文 1 篇等。儘管作文是用文言文，還是白話文，悉聽應試者尊便，<sup>30</sup>但是，由於當時的國學老師陳垣、余嘉錫等人都喜歡文言文的緣故，因而輔大同學總結出通過國文筆試的秘訣是作文用文言文，<sup>31</sup>這樣的要求不可謂不嚴格。筆試通過後，還有口試關，「口

<sup>28</sup> 輔仁大學檔案·全宗號：J218，目錄號：1，案卷號：81，《北平輔仁大學入學考試簡章》（民國 23 年 7 月訂）（現藏北京市檔案館）。

<sup>29</sup> 傅試中，〈憶余季豫先生〉，收入董鼎總編輯，《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 年），第 124 頁。

<sup>30</sup> 輔仁消費合作社編，〈歷年入學之試題〉，《輔仁向導專刊》（1939 年 7 月 10 日）。

<sup>31</sup> 祝士維，〈介紹輔仁化學系〉，《輔仁生活》，第八期（1940 年 6 月 18 日），第 5 頁；林辰，〈憶恩師余嘉錫先生〉，收入董鼎總編輯，《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第 151 頁。

試占相當地位」，並由系主任親自主持。內容是有關中學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以化學系為例，「內容不過是問問普通儀器的名稱，化學的主要定理及主要反應式，並不是太難的，可是你要知道問答都是要用英文的。」<sup>32</sup>

輔大歷年報考、錄取情況統計表（1927-1936年）<sup>33</sup>

	1927年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報名人數	50	53	140	437	788	1020	571	594	749	1048
招生人數	34	35	79	197	301	233	235	293	291	331
錄取率（約）	68%	66%	56%	45%	38%	23%	41%	49%	39%	32%

從上表來看，輔仁大學最初兩年的報考人數和招生人數都是最低的，錄取率達66%以上，對一個新的私立大學來說，是很正常的事情。從第三年開始，報考人數和招生數呈現明顯增長之勢，錄取率逐年大幅度下降，競爭激烈程度明顯提高。教務長劉半農認為當時學校對新生的素質要求儘管比國立大學稍許差一點，但是已經比某些私立大學高得多了。譬如，1929年秋季招生時，某人投考本科國文系一年級，劉半農認為該生國文基礎太差，因而準備將他降至高二年級。該生不情願，提出可否作為一年級旁聽生，但未獲准。結果，幾天後，劉半農發現該人竟被北京的另一所私立大學國文系作為本科一年級的第一名錄取。<sup>34</sup>這足以證明輔仁大學對入學考試的嚴格性、規範性。前6年的新生錄取率呈逐年大幅下降趨勢，至第6年（1932年）降至最低點，僅為23%。該年報考人數比前一年增加了234人，錄取數反而較前一年減少68人，不增反降的原因有哪些呢？我以為有以下二個方面。

首先，可能與當時學校日常經費出現的困難有關。由於美國經濟危機爆發，輔仁主辦者美國本篤會籌集經費四處碰壁，出現了嚴重的債務危機，學校日常運作與發展受到影響。<sup>35</sup>那時北京有的私立大學收取高學費，把學費作為維持學校生存的經濟基礎，因此招生是多多益善。輔仁實施低收費制，每學期學費收入只及開支的1/10，「所以多一個學生，就要多賠一個人的錢。」<sup>36</sup>其次，與招生質量要求有關。儘管考生很多，但是，可

<sup>32</sup> 祝士維，〈介紹輔仁化學系〉，《輔仁生活》，第八期（1940年6月18日），第5頁。

<sup>33</sup> 資料來源：《北京輔仁大學》（1927年）、《輔仁大學年刊》（1936年）、《輔仁大學一覽》（1937年度）、〈輔仁大學歷屆畢業男女人數表〉（1948年），均為輔仁大學自印。

<sup>34</sup> 劉半農，〈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半農雜文二集》，第201-202頁。

<sup>35</sup> (美)Jerome Oetgen 著，張琰譯，《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1923-1933）》（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3-67頁。

<sup>36</sup> 劉半農，〈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半農雜文二集》，第201頁。輔大的收費標準，

能高素質的學生人數並不是很多，怕招生人數太多而使招生總體質量下降。在這兩種因素中，後者很可能是最主要的。因為輔仁自 1933 年起轉給經濟實力比較雄厚的德國聖言會經辦，學校辦學經費有了可靠保障，招生人數有所回升，並逐漸增加，但沒有大幅度上升。因此，怕賠錢並不是主要原因，關鍵還是看學生素質。「我們不願招生太多的緣故，並不是因為怕賠錢；我們辦學之前，就預備賠錢的；怕的是招生太多，就不免濫收。」<sup>37</sup>嚴把招生關口，寧缺勿濫，保證學生總體質量，力求逐漸提高，是輔仁大學一貫堅持的原則。

考進輔大難，走出輔大更難。對於成功地通過入學考試進入輔大的幸運者來說，學校迎接他們的將是 4 年非常辛苦的學習生涯。由於輔仁大學授課的教授們個個都是學識淵博而又有專長的名師，教學態度始終非常認真、一絲不苟，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比如陳垣所開設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史源學實習》等課程，都注重學生「在做中學」，通過學生親自動手實踐，培養研究的能力，同學們在學習過程中感覺十分辛苦。教育系張懷教授是位有名的嚴師，他把西方大學教學方法帶到輔仁，對學生要求「極為苛刻」：「每次上課，必指定看 10 多本參考書，只這一手兒，就把系內學生逼得雞飛狗跳了；何況考試時，他絕不按牌理出牌，所出的題目，都是課外的，沒瀏覽過參考書，拿起考卷，必然不知所云。」同學們總感覺「上他的課很頭痛」，但是他所上的課都是「教育概論」、「教育哲學」等必修課，是想躲也躲不掉的。<sup>38</sup>又如許多同學震於小學大師沈兼士先生的大名，以得到他的親炙受教為榮，而踴躍選修他的課，但十分畏懼他的嚴厲。<sup>39</sup>

就考試來說，輔仁教務處規定，每年必須經過四次嚴格的考試，較一般大學的一至二次為多，而每門課平常的臨時考試更是不計其數。<sup>40</sup>平常考試也是很難、很嚴。據同學回憶起沈兼士開設「說文研究」課所進行的一次情況說，當助教把沈先生出的試題寫在黑板上後，說大家可以翻書。但同學們都傻了眼，連題目都看不懂。助教把題目解釋之後，大家仍是不會做。助教於是指出幾本參考書，由一名同學立即到圖書館把它們借來，

---

以 1928 年度為例，學費：每人 20 元／學期；雜費：每人 1 元／學期；住宿及燈爐等費：每人 5 元／學期。輔仁大學檔案·案卷號：4，《輔大沿革》（1928 年）。

<sup>37</sup> 劉半農，〈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半農雜文二集》，第 201 頁。

<sup>38</sup> 公孫燕，〈抗日愛國的張懷教授〉，收入董鼎總編輯，《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第 122 頁。

<sup>39</sup> 王靜芝，〈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先生〉，收入董鼎總編輯，《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第 111 頁。

<sup>40</sup> 葉世英，〈輔大男部生活雜寫〉，《輔大年刊》（1939 年）。

助教與同學們共同翻閱、討論，大家有所啟發之後，才能夠答題。<sup>41</sup>這是輔仁大學老師對學生要求嚴格的一個縮影。

考試及格在輔大並不能萬事大吉。輔仁大學實行學分制和選修制，考試成績與學分、選修以及升級、留級、退學等學籍管理直接掛鉤。輔仁大學及格線定在 60 分，並把成績從 100 分到 60 分按每 5 分為一個等級，確定相對應的成績分。如成績 95-100 分，等級定為 A+，對應 4.5 成績分；成績 90-94 分，等級定為 A，對應 4 成績分；依次類推，成績 60-64 分，等級定為 D 等，對應 1 成績分。

輔大對學生在學分與成績上的要求作了明確而嚴格的規定。首先，本科學生在 4 年間，除了按教育部要求修畢 134 學分，還必須得到 201 成績分，才能取得畢業資格；其次，每學年所得成績分與其應得學分的關係為至少達到 3 比 2 才能升級；第三，每學期所得學分不足應得學分之半，或已經留級一次，成績分又不足，不能升級者，便被認為是學業劣等的人，令其退學；第四，包括二年級在內的高年級學生，學年總成績平均為 C、B、A 等者，允許下學年每學期分別可加選修課程 2 學分、3 至 4 學分、5 學分，<sup>42</sup>也就是說平均成績為 D，儘管達到及格要求，但沒有上選修課程的資格。沒有學完選修課，不能畢業，每年選修課少，則無法按時修畢規定學分，不能按時畢業。通過這些學籍管理制度，我們便不難看出當時輔大學習是很不輕鬆的。難怪當時輔大學子這樣感歎道：「輔仁是華北各大學中辦理得最嚴格的一個」。<sup>43</sup>

輔大辦學伊始對學生的要求就非常嚴格，而且是它一貫的校風和精神。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同學在中途被淘汰，有的因留級則多學 1 至 2 年，最後的成功者不多，按時畢業者更是少數。譬如，1927 年招收的首屆學生是 34 名，等到 1931 年僅有 11 人畢業，畢業率僅為 32%。至 1936 年，6 屆畢業生總數為 401 人，而前 6 年招生數是 879 人，年平均畢業率也只有 46%。這裏的每一名畢業生無一不是經過千錘百煉。嚴要求才有高標準，嚴師才能出高徒。正是輔大一貫的嚴格校風，才使當年的「天之驕子」們在經過艱苦的磨練之後，既獲得了紮實的基礎知識，又培育了非凡的發展能力。它也由此在短短的 20 多年時間裏儘管培養的畢業生不多，但是，其中不少成為了各方面精英人才。

在今天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已經達到大眾化發展階段，進大學的門檻較

<sup>41</sup> 王靜芝，〈文學院院長沈兼士先生〉，收入董鼎總編輯，《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第 113-114 頁。

<sup>42</sup> 〈輔仁大學學則〉（1936 年），收入吳惠齡、李壑編，《北京高等教育史料》，第一集，近現代部分（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2 年），第 223-225 頁。

<sup>43</sup> 葉世英，〈輔大男部生活雜寫〉，《輔大年刊》（1939 年）。

之半個世紀前已大大降低，但是，大學培養人才的標準卻一點也不應該降低。根據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高等教育大眾化也不能使知名大學喪失培養社會精英人才的使命，因此，輔仁大學的嚴格校風及其某些學籍管理制度仍沒有失去它的價值。

### 五、在科學研究上強調「動國際而垂久遠」的精神

大學之所以稱為最高學府，最主要在於大學是科學研究的中心，從而對科學研究的承擔者教師在職責上提出的要求是，大學教師不僅是知識、思想的傳播者，而且是知識、思想的創造者。在現代社會後者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輔仁大學在科學研究上既有顯著的特色，在某些研究成果上也在國內乃至國際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輔仁大學史學、國文、物理、化學、心理、化學、教育、生物等學科都薈萃了不少學有專長的中外學術名家，他們在各自的學術研究領域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陳垣的史學研究、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沈兼士等人的中國語言文字學研究、余嘉錫的中國目錄學研究在國內學術界非常有開創性、經典性。陳垣的史學研究更是享譽國際學術界，陳垣、余嘉錫二人正是由於他們在學術上取得了非凡成就而於 1947 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生物系教授張漢民主持的斑疹傷寒疫苗研製則是把世界最新研究成果介紹到中國，並有所創新，而且把所生產的疫苗服務於社會，取得於較好的社會效果。教育系張懷教授專注於天主教教育思想的研究和介紹，著述甚豐。化學系教授、著名化學家薩本鐵博士以對維生素的研究（實驗證明）而著稱於世，尤其是對維生素 C 和維生素 K「尤有心得」。1933 年，他應用澱粉質試製出維生素 C，並創立了「薩氏學說」進行解釋，1939 年應用衛生球製出維生素 K，從而證明瞭由丹麥人 Dam 於 1935 年發明的維生素 K 的存在及其性質。<sup>44</sup>物理學系教授嚴池（Augustin Jaensch）博士（德國人，天主教司鐸）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超聲學研究方面成績突出，來輔大執教中繼續研究，該項研究在當時中國尚屬首創，而且「在遠東亦堪稱獨步一時之新學科」。<sup>45</sup>

輔仁大學在學術研究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非陳垣莫屬。陳垣作為一代史學大師，是輔仁大學的精神領袖和旗幟。陳垣原本是學習西醫的，從未到現代大學受過史學專業訓練，而是在早年私塾中的國學訓練中愛上史

<sup>44</sup> 〈薩本鐵博士〉，《輔仁生活》，第 9 期（1940 年 10 月 15 日）；白峰、趙旭，〈化學家薩本鐵訪問記〉，《輔仁生活》，第 10 期（1940 年 11 月 15 日）。

<sup>45</sup> 〈校史述略〉，《輔仁大學年刊》（1937 年）。

學，並通過張之洞的目錄學名著《書目答問》的指引，自學史學名著和廣泛閱讀史學文獻，由此掌握了清代考據學方法。他尤其服膺清代中葉考據大師錢大昕，並以他為師，運用考據學研究中國歷史問題。自 1917 年撰寫發表第一篇史學論著《元也里可溫教考》之後，一發而不可收。終其一生，他共發表史學著作 18 部，學術論文、雜文 159 篇，史學論著總字數約有 260 多萬。<sup>46</sup>

陳垣發展了中國傳統史學方法考據學，從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並通過在輔大、北大、北京師大等校歷史系所開設的《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史源學實習》等課程以及談話、通信等方式把他的史學研究理論和方法傳承下去，影響了一大批史學人才。他教導學生不要再像中國傳統的國學家那樣「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近自書本，遠至器物調查，什麼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文藝等無所不包。」而專做「窄而深」的研究工作。<sup>47</sup>他平時反復強調做史學研究比「別人」做得更好的秘訣就是「縮短戰線，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方足動國際而垂久遠」。<sup>48</sup>即集中精力在斷代史和專題史等兩個方面下工夫。他自己率先垂範，始終專注於研究中國宗教史、歷史文獻學、元史等專題史和斷代史，而且所撰寫的一系列史學著作都是傳世的經典之作，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動國際而垂久遠」的學術影響。特別是關於中國各種宗教史（也裏可溫教、摩尼教、火祿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天主教、佛教等外來宗教入華史）和中國歷史文獻學（校勘學、史諱學、年代學、目錄學）的研究，都是過去一般學者所忽視的重要問題，故陳垣「一經做出成績，即為學林所推重，這些地方，顯得先生常能適時尋空蹈隙，提出重要有意義的問題，用最大努力，搜集資料，寫成專書或論文，獲取學林的重視。」<sup>49</sup>早在民國時期（20 世紀 30 年代），中外學人就曾高度讚揚陳垣在中國史學界的學術地位，「日本多學人，今中國學人，止有馮友蘭之哲學，陳垣之史學，楊某（指楊樹達——引者注）之訓詁學，足以抗衡日本」。<sup>50</sup>世界著名漢學家法國的伯希和讚賞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即陳垣——引者注）兩人。」<sup>51</sup>在治學態度上，陳垣一貫保持一絲不苟、嚴肅認真的嚴謹學風，形成了樸實無華，實事求是，不尚空談，文字簡潔，謙遜審慎等風

<sup>46</sup> 牛潤珍，《陳垣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第 120-121 頁。

<sup>47</sup> 蔡尚思，《陳垣先生的學術貢獻》，《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北京：三聯書店，1982 年），第 8 頁。

<sup>48</sup> 陳垣，《致蔡尚思》，收入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第 355 頁。

<sup>49</sup> 嚴耕望，《史學二陳》，《大陸雜誌》（台灣），第 68 卷第 1 期（1984 年 1 月）。

<sup>50</sup>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積微翁回憶錄、積微居詩文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57 頁。

<sup>51</sup> 尹炎武，《致陳垣》，收入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第 96 頁。

格，並且告誡學生在學術研究上也要以此為標準。比如在史料上，首先要竭澤而漁地搜集材料，重視第一手材料，其次是善於鑒別資料的價值、真偽、檢驗資料的正誤和可信程度，然後在此基礎上運用史料進行研究、撰著，但觀點、結論要慎重，「做學問一定要審慎，不可輕率下斷語。」<sup>52</sup>

陳垣常常教育學生：「一篇論文或專著，作完了不要忙於急著發表，好比剛蒸出的饅頭，須要把熱氣放完了，才能去吃，蒸的透不透，熟不熟，才能知道。」<sup>53</sup>陳垣總有一個習慣，寫好文章後，總是要主動請各方面的人（包括比自己水平高的人、與自己水平相等的人、比自己水平低的人）批評指正，耐心聽取學術上的「諍友」的意見，「因為這可以從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sup>54</sup>從而儘量避免在文章發表時不留或少留遺憾、乃至錯誤。故此，他有時覺得論著尚不成熟，即使已經完成了的，也寧肯不發表。他還要求學生在對待別人論著中的錯誤更要謙遜審慎，「前人文章中偶有疏漏差錯，寫文指出以使讀者注意則可，萬不可自鳴得意，或得理不讓人。」<sup>55</sup>

當前中國大陸學術界出現了抄襲、剽竊、弄虛作假、文人相輕等不良學風，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勢，並已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思考。導致這種情況的原因並不是偶然和簡單的。這既有學者個人的道德品質問題，更與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考核體系直接相關，無論如何，學術管理部門和政策制定者們是脫不了干系的。作為學者、教師、校長的陳垣先生所強調的謙虛謹慎學風，既值得學者們認真學習和效仿，也為學術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改革學術管理辦法提供了很好的啟示和借鑒。

輔仁大學的辦學特色當然不只以上 5 個方面。我們僅僅通過以上 5 個方面的特色，儘管存在很短（從創辦到終結僅存在 20 多年），辦學規模很小（僅有 3 個學院、10 餘個系，教師人數最多時也沒有超過 300 人，在校學生數最多時也僅有 2000 餘人，培養的畢業生也不多），辦學條件十分艱苦（常遇到經費的困擾），環境十分惡劣（時局動蕩，戰爭的侵擾），卻能很快躋身於當時的名校行列，不難理解其取得成功的原因。在我們今前創辦高等教育之時，毫無疑問必須向歐美國家學習最新辦學理念與方法，以趕上世界高等教育發展步伐，但是不能亦步亦趨。既如此，就必須注意總結中國近現代高等教育辦學的成功經驗，繼承優秀辦學傳統。輔仁大學的辦學傳統與特色就是一筆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對當前高等教育管理、學

<sup>52</sup> 劉乃和，《勵耘承學錄》（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83-84頁。

<sup>53</sup> 《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96頁。

<sup>54</sup> 《勵耘書屋問學記——史學家陳垣的治學》，第39、96頁；劉乃和，《勵耘承學錄》，第82頁。

<sup>55</sup> 劉乃和，《著作的標題與學者的用心》；劉乃和，《歷史文獻研究論叢》，第204頁。



風建設、學科發展、大學精神的弘揚、大學生人文素質的培育、學術發展等諸方面都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 後 記

多年來，我一直從事在華西人與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史的研究，1999年秋到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之後，開始把輔仁大學作為研究課題。由於輔仁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的「血緣關係」，對輔仁大學帶有天然的親切感，研究輔仁大學是北師大人義不容辭的責任。通過幾年的耕耘，出版了《身等國寶 志存輔仁——輔仁大學校長陳垣》（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二部著作，並發表了幾篇相關學術論文。

今逢輔仁大學建校八十周年之際，承蒙台北輔仁大學邀請，赴台與各方人士研討、交流，十分感謝！

我今後仍將致力於輔仁大學史的研究，希望繼承得到各位前輩、同行及有關方面的支援、幫助、批評。

2005年11月